

Stephen Owen

宇文所安作品系列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827-860)

〔美〕宇文所安 著

贾晋华 钱彦 译



晚唐

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
(827—860)

Stephen Owen

宇文所安作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827-860)



晚唐

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

(827-860)

〔美〕宇文所安 著

贾晋华 钱彦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 / (美)
宇文所安著；贾晋华，钱彦译.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4.3
(宇文所安作品系列)
ISBN 978-7-108-04807-3

I. ①晚… II. ①宇… ②贾… ③钱… III. ①唐诗—
诗歌研究 IV. ①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74110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5

字 数 375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5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THE LATE TANG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 by Stephen Owen, wa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in 2006.

Copyright ©2006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目 录



导言：后来者	1
第一章 背景	19
第二章 老人	41
第三章 五言律诗	88
第四章 诗歌巧匠	116
第五章 李贺的遗产	157
第六章 七言律诗：“怀古”	183
第七章 七言诗人	223
第八章 杜牧	251
第九章 道教：曹唐的例子	308
第十章 李商隐：引子	326

第十一章 李商隐：朦胧诗 349

第十二章 李商隐：咏史诗 399

第十三章 李商隐：咏物诗 433

第十四章 李商隐：应景诗 466

第十五章 温庭筠 506

结论 544

引用书目 548

导言 后来者

柳岸风来影渐疏，使君家似野人居。
云容水态还堪赏，啸志歌怀亦自如。
雨暗残灯棋欲散，酒醒孤枕雁来初。
可怜赤壁争雄渡，唯有蓑翁坐钓鱼。

——杜牧《齐安郡晚秋》〔1〕

公元842年春天，四十岁的杜牧前往黄州出任刺史。黄州亦名齐安，位于今湖北长江北岸，著名的赤壁之战的战场据说就在该州境内。赤壁之战的故事广为人知，记载于有关那一时期的正史《三国志》中，并很可能在当时已是民间传说传统的一部分。曹操率领北方大军来到赤壁，准备渡过长江，进攻南方的吴国。他在那里准备好进攻的船队，用铁链将船只锁在一起抵御风浪。

吴国年轻的长江水军都督周瑜负责阻挡进攻。周瑜知道曹操正在等待一批粮运，便召集了火船，装扮成运粮船，掩护战船队。整个计划依赖于一阵东风，而那天真的刮起了东风。当粮船

〔1〕 28153；冯，208页。

靠近时，吴军点起火，火势很快蔓延到曹操那些锁在一起的战船。曹操丢失了所有的船只，无计可施，只能退回北方，江南仍归吴国统治。

九世纪中叶的黄州地小物贫，受命来此任刺史固然不算是最差的职位，但离最好的却相去甚远。杜牧曾不无自嘲地描述黄州为“平生睡足处”，此句正好捕捉了上引诗篇前半部分的精神。风吹落岸边的柳叶，慢慢展开景色，但也为刺史的宅院带来纷乱。诗人以其特有的成熟，在此既能欣赏景色，又能欣赏生活。

杜牧在尾联首句所用的诗歌手法在晚唐诗中并不算新奇，但在这一时期出现非常频繁，似乎与这一时代有特别的共鸣。这是一种通过慨叹已不存在的过去而唤起的缺失场景。在这首诗中，缺失的场景是战斗和燃烧的战船，在这幽灵似的背景上添加的是现在的老渔翁形象。老渔翁全神贯注于钓鱼，显然与我们的刺史诗人分享同一情绪境界。当然，区别在于只有诗人能够在看到老渔翁的同时，脑海里也浮现出燃烧的战船。

这种并置创造出一些重要的关联：在老渔翁身上，我们看到缩微——与水军船队和熊熊火焰的大战相比，他成为广阔风景中的一个微小人物；我们看到老化——深秋季节中的一位老人；我们看到已消失的辉煌，取而代之的是静谧和安宁。老渔翁这一人物并非普通之人：他有自己的文化历史和诗歌历史。虽然没有姓名，但在杜牧的诗篇之前已经出现过无数次：他是为周文王所赏识并请去做丞相、制定克商大计的渔父姜太公，他是后来屈原碰到、劝说屈原不必担心美德被误解而应随顺时流的渔父。他曾象征过很多东西，所以在此并非单指一项：他本身在诗中含意模糊，但却肯定“饱含诗意”。几十年前，冬景中的渔翁曾出现在

柳宗元最著名的题为《江雪》的诗篇中〔2〕：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老渔翁是典范的诗歌人物，富于感发力，寓意丰富。在杜牧的诗篇中，他是一位被置于远距离画面的人物，用来取代暴力的场景。他为古战场带来的画面，已预示于第五句中棋盘上被拿走的棋子，亦即成为真的“散”。此处我们既看到冲突的后果，也看到这一冲突在形式上转换成游戏。比喻战争时代的“风暴”化成一场真正的暴雨，其阴云遮暗了棋盘。这就是诗歌的“作用”：将动乱转化成优美的模式和形象，重新加以编排。

与杜牧同时代的温庭筠在一首诗篇中，描绘汉武帝在长安附近的昆明湖上演习水战，使用了同样的添加手法。通过象征性的威胁和感应巫术，武帝征服了西南边远地方的敌国滇池。汉武帝是赤龙的后代，先以涟漪层层红色倒影出现，随之而现的是他的战舰和武士。

昆明治水战词〔3〕

温庭筠

汪汪积水光连空，重叠细纹交激红。

赤帝龙孙鳞甲怒，临流一眄生阴风。

〔2〕 18520；王国安，268页。

〔3〕 31900；曾，32页。

鼙鼓三声报天子，雕旗兽舰凌波起。
雷吼涛惊白若山，石鲸眼裂蟠蛟死。
滇池海浦俱喧豗，青翰画鹢相次来。
箭羽枪缨三百万，踏翻西海生尘埃。

然后，在最后一节中，温庭筠又回到现在：

茂陵仙去菱花老，唼唼游鱼近烟岛。
渺莽残阳钓艇归，绿头江鸭眠沙草。

茂陵是武帝的陵墓，没有人会不注意到称他为“茂陵仙”的讽刺意味，特别是考虑到武帝对成仙的热烈追求。诗篇前面几节引发出的过去场景并不涉及实际暴力，而只是军事力量的戏剧性展示。它具有自己的诗意美，而当这种美被引发后，随即便被现在见到的另一种美所替代。那一片水恢复了宁静，古战舰的鸟形船头被正在熟睡的绿头鸭所替代，渐暗的暮色中出现了载着诗意化的老渔翁的钓艇。

晚唐诗常常回瞻，这个时期的很多诗人都以回顾眼光的热烈而著称。过去的迷人时刻，无论是历史的还是诗意的，都引起他们的注意，萦绕着他们的现在。中国诗人如同欧洲中世纪诗人一样，总在某种程度上往回看，但对很多晚唐诗人来说，过去的回响和踪迹具有特别的光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晚唐”确实应该被称为“晚”。我们的研究到860年左右为止，所以虽然这些诗人肯定意识到政体已陷入困境，但不能说他们已觉得王朝末日将临。站在过去的大诗人和过去辉煌的阴影里，他们的“晚”主

要是一种文化上的迟到感。

到了九世纪中叶，玄宗朝（始于八世纪第二个十年，延续至755年的安禄山叛乱）已成为具有传奇色彩的辉煌时期。活跃于安禄山之乱后的诗人，后来被与大历时期（766-779）联系在一起，为律诗巧匠树立了古典美和形式格律的楷模。随后是与元和时期（806-820）联系在一起的中唐诗人，他们留下了丰富的创新遗产，为诗歌开拓了新的方向。很多较年轻的诗人排斥这一遗产，但此遗产来自刚过去的时代，而且意义重大。到我们的研究开始的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叶，诗歌已有一百年刚刚逝去的难忘历史。

描述晚唐诗歌，无可避免地必须回答如何使用这一分期术语的问题。“晚唐”这个词原本用来指755年安禄山叛乱以后的一个半世纪；换言之，它跨越了唐代整个后半时期。显然，如此划分不仅对文学研究无益，而且对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无用。高棅（1350-1423）编于1393年的《唐诗品汇》，使“中唐”成为了约定俗成的概念，截止于元和一代诗人。这样唐代大约最后七十五年便成了“晚唐”。区分“中唐”有助于说明元和时期的著名诗人与后来的诗人间的一些突出差异。活跃于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间的诗人们强烈地感受到这些差异。几百年来有关唐诗历史的评论都把这种权宜的分期当作是真实的、不言而喻的。然而，实际的记载却使这种简单分期变得复杂。

文学史家们喜欢概括地描述各时期的特征。然而因为晚唐诗歌存留下来的数量之大，又因为诗歌创作的社会和地域分布之广，我们发现在这一时期里诗歌其实朝着多方向发展，其多样性

使人无法简单地概括。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兴趣相投的诗人群体，新时尚的兴起，特定的地点成为诗歌创作的中心，以及某些诗人无视当代诗歌时尚而走自己的独特道路。换言之，细看之下，除了代表一个时期以外，并没有一个协调一致的“晚唐”。

即使只把它看作是一个时期，从文学文化方面界定晚唐的概念也面临问题。就这一词语中的“唐”字而言，晚唐应该结束于公元907年，即唐王朝正式结束的时间。即使唐朝在最后几十年里已经仅是一个空壳朝廷，很多诗人在后来发展为五代十国的方镇和地方朝廷任职。然而，如果我们寻找文学文化和诗歌世界的巨变，那么只有到了十一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以欧阳修为主的一群诗人出现时才能找到。如果我们不过分追究这一分期词语中的“唐”字，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晚唐诗歌视作长达两个世纪，颇像南朝后期的诗歌风格，跨越了一个过渡和建立稳固的新体制的时期。

当诗歌最终在十一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经历了巨变以后，欧阳修有意识地以韩愈为自己群体的榜样，回归九世纪初的元和一代诗人。元和主要诗人的去世，以及对他们的诗歌风格的明显抵制，为我们清楚地标明了晚唐的开端（虽然下文我们将谈到，白居易和刘禹锡又生活了数十年）。这样一个诗歌兴趣的反叛和重新定向的时刻，的确标志了一个时期的转变。

我们的研究将始于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叶的变革时期，大致延续至860年。后面这个日期只是出于方便，并非因其标志着一个变革的时刻。在这将近三十五年的时期里，一群元和时期遗留下来的老一辈诗人仍创作出大量诗篇；贾岛完善了一种律诗技巧，从而吸引了半个世纪的忠实追随者；代表晚唐诗歌特点的三位诗人杜牧、李商隐和温庭筠则完成了他们几乎所有的诗篇。在这

三位诗人当中，李商隐和温庭筠的诗歌成就在有生之年都未获得普遍承认。杜牧虽然闻名于世，但他与当时很多诗人齐名，而那些诗人现在大多已不为人知。

这一时期，唐朝还未出现立即崩溃的危险，但是到了这一时期结束之时，叛乱已陆续在各地发生。朝代分崩离析的过程已经开始，并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不断加速。自 881 年初黄巢占领长安后，唐朝已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势力，虽然仍保留着一种怀旧的光晕，吸引着无数来自偏远地区的年轻人前来寻求那些唐朝仍有权力授予的空泛官衔的荣耀。在 860 年后仍有很多诗歌值得欣赏。人们很容易将这一较后时期的诗歌与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联系起来看，但此时创作的大多数诗歌只是继续着我们所研究阶段的诗歌传统。这似乎是一种受了创伤、僵化了的诗歌。如果想要披露诗歌史与更宽泛意义上的“历史”的关系，我们所发现的可能不是变革中的诗歌，而是拒绝变革的诗歌，完美的对偶句，及沉迷于诗歌的和感官的愉悦。

下引子兰的诗中，伟大的京城长安的厄运已经注定。有关僧人子兰的生平，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在唐朝的最后时期还在做诗。此诗前两句可能撰于任何时候，但后两句所唤起的可能是长安的其他时刻。

长安早秋^{〔4〕}

子兰

风舞槐花落御沟，终南山色入城秋。

〔4〕 44998。

门门走马征兵急，公子笙歌醉玉楼。

最后一行重复了李白的著名诗句，原句写于较欢乐的时候，但现在却含有阴郁的反讽。我们无法确定下面这首诗是否与上一首诗作于同时，但很难不将它作为季节的续篇来阅读。我们知道黄巢在881年进长安的时候，开始时是受欢迎的。在洗劫长安城及随后忠于唐王朝的势力与黄巢军之间的战斗中，长安的居民竟如同军队一样凶恶可怕。

长安伤春^{〔5〕}

子兰

霜陨中春花半无，狂游恣饮尽凶徒。

年年赏玩公卿辈，今委沟塍骨渐枯。

此处我们看到的是对长安城死亡的生动描绘。但是长安城未陷之前，当马群还在奔走，士兵还在被募集去保卫这座城市时，那些宴会上所写的诗篇，可能与我们将要读到的诗篇很相像。同样的诗篇至五代时在各地区可能被广为模仿，但是最早产生这种诗歌的社会已经死亡，只留下尸体在深沟和野地里腐烂。

虽然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间的诗歌丰富多样，不允许我们只用单一的总体特征来概括，但我们的确看到新的价值观和兴趣的兴起。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新现象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稍早的时

〔5〕 45002。

期，并延续于整个九世纪，直至十世纪。我们已讨论过晚唐诗人的回瞻眼光，以及他们对过去的诗歌和文化的迷恋。南朝后期特别令他们感兴趣。这种兴趣很容易被看成是对死亡笼罩着唐朝的预感，但这很可能只是一种间接的关联。他们感兴趣的是各种形式的沉迷，南朝诗人不顾一切沉迷于诗歌和感官愉悦中的形象，在他们心里激起一种矛盾心情，既吸引他们，又迫使他们对之进行谴责。

沉迷是一种排除外部世界、内省及孤立某一特定事物或范围的方式。沉迷的形象在这一时期的诗人和诗歌代表中承担了重要角色。我们看到将诗歌作为独立活动领域的感觉越来越强，诗歌要求绝对的投入，“诗人”成为一种独特的类别。诗歌创作继续被唐代知识精英各阶层所共同实践，但我们发现有些群体倾注全副心力做诗，视诗歌为一种使命，而与此相对的是在朝廷的圈子内有些人对“诗人”越来越轻视。^{〔6〕}随着诗歌成为一个独立的献身领域，像僧侣献身佛教一样，诗人开始视自己的诗歌为一种积累和“遗产”，如同土地、商品的集聚，或如同终身仕宦生涯或佛教实践的“功德”积累。很少有诗人像白居易和贾岛那样截然不同，但我们发现两人都筹划以手稿的物质形式积累自己的诗歌作品。在八世纪第二个十年，元稹已经致力于整理自己的几个文集，白居易紧随其后，编集了数部手稿，并不断更新和补充。到九世纪中叶，整理编辑自己的诗歌已广为开展，同时还产生了未

〔6〕 南宋批评家严羽极不赞赏晚唐诗歌，但到他的时代，晚唐所发生的变化已经被广泛地吸收而成为理所当然之事。因此严羽坚持认为诗歌应该“当行”，这可能是古汉语中意思最接近“职业的”之词汇。

收入作者主集的、专收特定题材的小集。

沉迷诗歌的一种形态是致力于构造完美对偶句的技巧，以及颂扬这种技巧所需要的努力和全神贯注。我们下面将看到，这种细心雕琢的对句通常由其他较为松散直率的联句映衬，有时显露出俗语的影响（后一种成分在九世纪后期甚至经常更突出）。我们看到不同修辞层次间的差异和冲突不断增加，同时看到反对白居易所提倡的下层修辞的评语。在这种修辞层次的对立中，我们第一次窥视到一种“诗意的”或“古典的”感觉，这对后来的文学文化有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将“古典”作为标准来遵循或谴责其矫揉造作。此前只有具备各种修辞层次的“诗歌”，一首诗中往往自始至终使用同一种修辞层次。混合修辞层次的诗篇使得“高”和“低”之间的对照更为明显。

我们首先在第一章“背景”中提供政治历史背景，介绍诗人，并讨论这一时期的文学记录如何受文本保存方式的影响。随后在第二章我们转向“老人”，即元和时代的年长诗人，其中最突出的是白居易，他在九世纪四十年代仍然继续创作出大量作品。白居易挑战性的随意是元和诗歌价值观的一种创新，有助于说明第三章“五言律诗”中巧匠们的各种对立价值观。我们在第三章中论述这一保守传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其后在第四章“诗歌巧匠”中讨论姚合和贾岛的群体中的具体诗人。

在第五章“李贺的遗产”中，我们讨论九世纪三十年代初重新发现并传播李贺诗歌所产生的影响。在第六章“七言律诗：‘怀古’”中，我们以晚唐“怀古”诗为例，分析诗体的“个性”和历史如何影响诗歌创作。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后来的诗人如

何借用并改造前人的作品。第七章“七言诗人”讨论以七言律诗著称的一些诗人，这些诗人在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后重新受到欢迎。在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及四十年代，这些诗人都和杜牧有诗歌唱和，而杜牧的作品是接下去第八章探讨的对象。

在第九章“道教：曹唐的例子”中，我们探索这位道教诗人的一些作品，描述其色情化、浪漫化的游仙诗，为随后第十至十四章讨论李商隐的诗歌做准备。在介绍李商隐诗歌的阐释问题的章节之后，我们讨论他的朦胧诗、咏史诗、咏物诗，以及那些可以确定日期的应景诗。在这些章节中，我们试图将他的诗歌放置于其时代的话语语境中。最后在第十五章中，我们研究温庭筠的诗歌，并讨论将诗歌划分为专门的“类型”的情况。这种划分对其他诗人的作品在文学记录中的保存很可能有重大影响。

我尽可能历史地具体化，总是注意唐代诗歌遗产的文本保存方式，而不是对这一时期作整体的笼统概括。

本书深深地受惠于过去二十五年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傅璇琮的著作，他对唐代诗人生平及诗人和诗作系年的广博研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远远超出三十年前我研究初唐和盛唐时的情况。

同时，本书与中国学者所完成的工作有着基本的区别。虽然这些区别无疑地将会被归因于“西方”观点，但是我的部分意图却是调和中国学术本身的一种分裂，即一方面是对诗人生平和诗篇日期的精确考证研究，另一方面是有关这一漫长时期的各种笼统概括。此时期由于复杂的历史偶然因素而被标签为一个单一的整体，即“晚唐”。史料的丰富及傅璇琮等许多学者的努力，使